

炮火中的女記者

戈焰 著

重慶出版社



CHONGQING CHUBANSHE

炮火中的女记者

戈 焰 著

重庆出版社

1993年·重庆

川)新登字010号

责任编辑 陈小丽
封面设计 姚长辉
技术设计 刘黎东

戈 焰 著
炮火中的女记者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 经销 达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625 插页5 字数 133 千
1993年3月第一版 1993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00

*

ISBN7-5366-1994-4/I·379

定价：2.80元



作 者 近 照

P8768/01

戈 焰 小 传

戈焰，原名郭丽君，化名郭沫玲，笔名戈焰、戈炎、白桦等。祖籍四川重庆市江北县静观镇，1923年秋末出生于涪陵城。1937年春参加重庆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1938年10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939年夏毕业于延安中共中央组织部训练班，1939年9月到敌后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在西北战地服务团先从事音乐工作，后协助编辑《诗建设》诗刊。1940年冬到1943年春节，毕业于华北联合大学文艺队文学系。在此期间，创作诗数十首，被选为边区文协委员。1943年春到1949年春，任晋察冀通讯社、新华社察哈尔分社、冀热察导报社记者、编辑、编辑科副科长。解放后任《皖南日报》、《安徽日报》编委兼地方版主编、安徽人民出版社副总编、安徽省文联、省妇联党组成员、秘书长兼《安徽文艺》、《江淮文学》主编。1972年任陕西作家协会专业作家，1980年至今，任《陕西日报》高级记者。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序

魏巍

戈焰同志的《炮火中的女记者》行将问世，她要我写几句话。我们是老战友，在抗日战争中就很熟了。当时，她是来自天府之国的一位活泼天真的姑娘，比我们的年龄都小一些。据说她在学生时期就是个活跃分子，参加过一些抗日活动，15岁就参加了党。一年之后，也就是1939年，她又穿越秦岭来到延安。到延安的事她没有跟母亲说，唯恐母亲不答应。当她背上行李同伙伴们出发的时候，看见母亲正坐在店铺门前察看她。她这时既怕母亲发现自己，又想多看母亲一眼，就把草帽沿儿往下拉了一拉走过去了。当时国民党很怕进步青年到延安去，戈焰他们路经西安时，还被他们抓捕过一次，幸亏他们机警地逃了出来。为了献身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当时的青年是怀着多么高的热情呵！

戈焰后来参加了丁玲、周巍峙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这个团长期活动在晋察冀。当时戈焰刚16岁，性格活泼开朗，能歌善舞。但她更醉心于文学，又从歌咏队调到了文学队。文学队有邵子南、田间、方冰等人，都是这块战斗土地上的诗歌明星。他们那一颗颗心简直像火焰在燃烧，无日无夜地在写着诗，并且以《诗建设》这份诗刊，团结着全晋察冀的诗人。戈焰就在这个队里协助他们工作，也开始写起诗来。不用

说，在这个难得的环境里，戈焰是会受到许多有益的熏陶的。

在抗战最艰苦的年分，戈焰来到了晋察冀的东线，这时她已经是晋察冀通讯社的记者了。具体工作的地区，在距保定不远的满城。那时满城仅有一小块山地在巩固区，其余平原地带都是敌占区。而且敌人挖了又宽又深的封锁沟，构筑了密密的炮楼，封闭着游击队进出的孔道。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戈焰以农村姑娘的打扮，手执六轮手枪，经常随游击队越过封锁沟，到敌占区活动，或打炮楼，或做群众工作，或征收公粮，以自己的亲身感受和所见所闻，写成通讯报道，在《晋察冀日报》和《新华日报》上发表。在那个年代，我们见她总是那么活泼乐观，经常哼着歌子，充满青年的朝气，就好像一只勇敢的燕子，出没于炮火之中，穿行在敌人点线之间。本集中收入的“炮火中的女记者”，就是她当年的写照。我在阅读本篇时，不禁神往久之，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充满浓郁诗意的战斗年代。那一代的青年虽然吃了很多苦头，冒了不少危险，但他们那种为理想而献身的青春的光辉，又是多么灿烂夺目呵！我想它也许会给人带来一些人生的启示吧！

戈焰长期从事记者工作，也相当时期从事文学工作。她身上很宝贵的一点，就是始终保持着青春的朝气。近年来她的笔耕不辍。为了历史上的一些珍贵事物不致流失，她总是东奔西跑地前去“抢救”。所以本集里除收入了一些她当年做记者时的作品外，还收入了她以文学回忆录形式写成的人物回忆，如对丁玲、邵子南、何洛等同志的回忆。这些回忆都是怀着很深的感情写成的，因之读来真实动人，由于作者

和邵子南相处过一段时间，这篇回忆录尤其写得好。邵子南才华出众，读书又多，还有一番不同寻常的经历，在祖国大地上流浪过，当过船工、学徒、见习生，还当过和尚，颇类似于高尔基的经历。他当时已经比较成熟，又正逢创作的高峰期，经常被诗情燃烧得难以安眠，创作了许多剧本、歌词和出色的诗篇。尤其是1943年经过对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学习，他下了最大的决心深入群众，在阜平五丈湾村当了一名小学教员。他头蒙白毛巾，身穿黑棉袄，简直和老百姓一模一样。反“扫荡”开始后，他就和爆炸英雄李勇的游击队一起埋地雷，一起战斗，吃睡都在一起。对游击队的每个成员，无不了如指掌。他以后写出了《地雷阵》的名篇，决不是偶然的。像邵子南这样一位杰出的作家和诗人，本来还会做出很大贡献，可惜解放后因病英年早逝，只活了39岁，真太可惜了！明年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戈焰同志对子南的回忆文章，是一个很合适的纪念。

弹指一挥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那个“炮火中的女记者”，恐已霜染两鬓矣！然而，她在《愿绿竹伴随一生》的散文里说：“绿，象征着旺盛的生命力和强烈的感情。竹，终身穿绿装，显得顽强、勇敢、不畏强暴。……在寒气凛冽之时，更是惬意地生出很多冬笋儿，摇曳着嫩绿的枝叶，向着高空升去。连天上的云彩也要为她让路！”也许戈焰本身就是这样一支生气勃勃的翠竹吧！

1991年岁末，记

目 录

序	(1)
战地记实	(1)
到满城游击组	(3)
狼牙山脚下静悄悄	(8)
巧妆改扮新娘	(12)
我也有错	(16)
忆访首次解放华北重镇张家口	(21)
忆翻了身的龙烟矿工们	(37)
文学回忆	(43)
元帅轶事	(45)
“西战团”的开拓者——丁玲	(71)
三位西战团团长	(91)
他还活在我们心间	
——忆西战团团员、诗人邵子南	(105)
日人反战同盟及其盟员	(117)
从延安背来的书	(125)
西战团始末	(135)
人造湖畔英雄颂	(159)
散文	(185)

月亮作证.....	(187)
愿绿竹伴随一生.....	(194)
后记.....	(200)

战 地 记 实

我是从炮火中锤炼成长起来的女记者，当时只有投身抗日、为抗日尽力的决心和不畏牺牲的精神，从来没有想到过在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仍然还干记者这个行当。不过，我深深体会到，这时候和那时候作记者，情形已很不相同。回忆往事，对今天如何当好一个记者，或是文学家，还是颇有教益。

到满城游击组

1943年春，我还不到20岁，从华北联合大学（人民大学前身）文艺学院文学系毕业，由晋察冀区党委分配到晋察冀通讯社当记者。当时《晋察冀日报》、晋察冀通讯社是合为一体的，驻地在河北阜平县滚龙沟。社长邓拓同志亲自找我谈话，要我到一军分区、一地委打仗最激烈的地方去锻炼。说是只有到第一线去亲身体验，才能写出好消息、好通讯、好文章。我背着沉甸甸的被包，沿着东线的道路，经过了曲阳、行唐、唐县、完县等几个县的边境，行程300余里，4天功夫就到达了一地委的驻地易县岑东村。来接待我的是晋察冀通讯社特派记者、地委通讯干事雷行同志。他传达了地委的决定，要我去满城县任特约记者、县委通讯干事。我二话没说，只一小时左右，就赶到满城县驻地易县赵庄。

满城是晋察冀边区一地委所属的一个游击县，只有半个

山区，绝大部分地区为敌所占领，环境十分恶劣，是通保定的门户，地势特别险要。假如站在狼牙山或抱阳山顶眺望，保定似乎就在山脚下，而满城却像孩童俯睡在保定的身边。两个城市相互依存着，而满城就更成了敌后的敌后，所以满城没有自己的根据地，干部要工作，只得在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保满支队掩护下，到沟那边敌人盘据的村庄去发动群众，改造伪政权，开辟和扩大根据地。

我一到赵庄，外号叫“济公”的县委书记石金奎和宣传部长李涛庭就来迎接我。他们给我介绍了大量的敌、我、友情况，还出主意叫我先到直属机关作采访。总之，对我这个远离天府之国的南方姑娘表示了极大的关怀和支持，从而加深了我对石“济公”的崇敬和仰慕。人们称赞他为“济公”，是名不虚传的，他真有点像武侠小说中的英雄人物。他年不过40，富有打仗经验，时常化装成各式各样人物，窜进保定、满城市内探听情况，在他任职年把时间，已攻克据点10余处，敌人害怕他，出1000元法币悬赏、捉拿他。于是，我下定决心，要向他学点打仗本领，并提出申请，希望他过沟时能带我去。一天上午，他来到我的房间，这房间是群众装粮食的半间库房，我正坐在炕上整理采访的素材，他手里提把比手枪大又比盒子枪小的枪：

“小戈，你不是吵着要去打仗吗？看看，这是什么枪？”他语音和气，不等我答，他解释说：“这是六轮子，我来教你！”

我很快学会了使用这支六轮，当要问何时带我出沟时，却不见他人影了。黄昏时候，他派通讯员通知我，叫立即

到保满支队驻地大院集合。进了大院，全体指战员已排好队，有分区摄影记者叶苍林，县政府秘书江涛，还有支队总支书记洪璞等同志，他们都在听张支队长训话。队伍出发了，不到一个钟头，这支队伍就停在沟口石井村了。石井村距沟外五六里远的地方，在月光照耀下，隐约可辨是敌人的据点——抱阳村。这抱阳村是敌人进山扫荡、我军向外出击、干部过沟外开展工作的必经之道，是一个重要的咽喉。正因为如此，我军把石井村的民兵游击小组培训得棒棒的，他们非常活跃，富有战斗经验，时常配合我主力部队和县地方武装，进行出击，保护全村群众的生命财产。他们右肩扛着“三八大盖”（最老式的步枪），左肩斜挂着一排手榴弹，平时走在街头，步伐唰唰地响，穿的是便衣，头顶羊肚毛巾，腰扎皮带，精神抖擞，除着装外跟正规部队没两样。这时，石井村的村长来了，村长和“济公”接上头后，村长吩咐立即将民兵游击小组散开，隐蔽在村口两边大道上。“济公”把我和江涛从队伍里叫出向村长作交待：

“戈焰同志是晋察冀日报记者，要好好保护她。”他转过头来对我和江涛说：“你们的任务是帮助村长搞好统一累进税，但是，这个村子是敌人的眼中钉，随时都有可能来拔这颗钉子，夜里不能老住一个地方，要听村长的安排。”

说实在的，听到让我留在村里，我的心都凉了，但我是共产党的记者，得绝对服从命令。脑际里闪出邓拓同志的一席话：“现在国际国内时局是：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在欧洲受到苏、美、英同盟国重创，扫荡北进，希特勒正在苏联红军的猛击下溃退，日寇将永远不能从希特勒那里得到什

么支持和策应。日寇侵略中国5年了，丧师250余万，只得利用大汉奸汪精卫‘参战’，在敌占区大肆抓丁，扩编伪军。敌占区物价飞涨，伪钞狂跌，人民生活极端困窘，敌人到处设立临时据点，四处抢粮，对人民进行“蚕食”。我明白“济公”留我在石井的意思，无非是乘我们的主力和地方武装以及民兵游击队主动向外出击之机，要求一个毫无战斗和工作经验的我，和群众打成一片，开展反“蚕食”斗争。这也是对我最好的考验。

我白天在村公所搞统一累进税，夜晚就随民兵游击队中队长活动。今天睡这家，明天睡那家，和村里群众混得滚瓜烂熟。那个民兵游击队中队长真是出色的小后生，他在装扮上和普通民兵一样，个头儿要比一般人高一头，浓眉大眼，说话可痛快，打敌人、抓汉奸，保护村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样样工作完成得顶呱呱。他背有一杆“三八大盖”，一有空他就教我如何上子弹，顶子弹门，我的六轮也被他抚摸得精光铮亮。就这样，一有机会，哪怕是夜里，我也要参加民兵游击队的活动。一天黄昏，我见村里来往走动着许多人，游击队搬动着桌椅，那些早吃完饭的群众，有的聚在院庭里，有的团在街道两旁，情绪亢奋地说着话：

“听说鬼子‘扫荡’在三分区踩翻了地雷，炸死了不少啊！”

“我们村的民兵把鬼子收拾惨了！”

村民们七嘴八舌使整个村子都沸腾起来，都在传颂着队长和民兵游击队的佳话。

对这样的民兵游击队能不动心吗？！记得当时我左手提

着顶了幢的六轮子，右手已捉住笔，迫不及待地爬上石井的山头上，利用大腿当桌子，写出了文艺通讯：《满城的一个游击小组》。后将此文发表于《晋察冀日报》7月23日的副刊版，我对自己的这篇处女作的发表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啊。